

目 录

同共产党并肩战斗的爱国志士李益闻先生·····	袁宝华 (1)
纪念李益闻先生·····	郭以青 (9)
坚强的爱国主义者李益闻先生·····	段雅亭 (14)
我所知道的李益闻·····	袁峻峰 (21)
南召地方自治始末·····	张泽霖、艾廷和 (23)
我在南召参加地方自治的回忆·····	袁宝岱 (38)
忆父亲·····	李中道 (55)
李益闻在内乡·····	黄廷响 (60)
忆南召自治·····	王锡璋 (62)
先父袁峻峰与南召自治·····	袁晴城 (70)
抗战时期在南召的片断回忆·····	张了且 (80)
《张了且日记摘抄》·····	(84)
我的叔父周启邦·····	周恩科 (88)
南召地方自治时期的彭寿松·····	郭海源 (94)
父亲彭寿松二、三事·····	彭伟贞 (97)
郭海昆事 略·····	郭海源 (102)
忆父亲铁子 名·····	铁志法 (109)
“南召惨案”中 的一一〇师·····	廖运周 (112)

同共产党并肩战斗的爱国志士

李益闻先生

袁宝华

李益闻先生是南召县白土岗附近谢村人。他的家庭经济生活不很富裕，在外念书是个苦学生，每月生活费只有5元钱。师范毕业，1924年到南阳南都小学当教导主任。这时我在那里上高小。后来，李先生代理校长，不久，当上正式校长。1926年南都小学停办，他回到李青店创办了一所小学，我又在那里读一段书。1928年他去开封和省里边办教育的人搞些交涉，回县后当了教育局长，宣布把庙产变为学产，庙里和尚曾雇人暗杀他，出几次危险，幸都没有被害。这时候彭锡田由外边回镇平办理地方自治，成立第二政权机构和济组织，很影响李益闻。1932年他去镇平一次，彭向南召推行自治，建立南召县四区自治联合办公处，李益闻为主任，管理政权、武装和民间事务。国民党组织地方绅士反对他，杨老庄地主联合到省里告状，省政府派保安团来南召剿灭自治派，杨老庄地霸武装提前向自治派发难，武装围攻自治派李青店区署。自治派在两面受敌当中，李益闻向彭锡田电话告急求援。彭锡田带领地方武装赶来南召，进军李青店后，枪杀了作恶多端的杨子青之弟杨三。不久，

省保安团把李益闻赶跑了。1933年春，彭锡田被暗杀。

1934年，李益闻在别廷芳的支持下返回南召重办自治，被国民党庞炳勋部队又赶出了南召。他到内乡县别廷芳处避难，在天明寺乡村师范当教导主任，很苦闷，对国民党严重不满。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曾拟发通电，响应张学良、杨虎城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因别廷芳不同意，电稿没发出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南阳地区统治力量薄弱，土匪在南阳城门口白昼夺枪，国民党不得不把宛西“土皇帝”别廷芳请出来任南阳专区联防主任，维持地方秩序。李益闻在别廷芳的支持下，代表南召参加南阳专区联防委员会为委员，又有了回南召工作的机会。他在南阳动员力量回南召。这时，我和从北平等外地回来的学生在南阳组织宛属平津同学会宣传抗日，同李益闻接触，交谈中向他讲了抗日的形势，南阳地区的作用等。他认为我在北京上学后有变化，对政治有认识，一再动员我回南召。当时我准备到敌战区工作，他再三劝说，我才同意回南召。他又把在内乡作事的共产党员张景芳也要了回去，又动员了一批原自治派的人。我大哥袁峻峰，三哥袁宝岱和彭寿松，段雅亭都是河南大学学生，他们基于抗日救亡的热情，抱着回到地方作一番事业的愿望回到南召。中共河南省委派胡子云、党及辰、王锡璋等同志到南召工作。他们是通过我大哥的关系来到南召的。周杰邦从旧部队回来探亲也被李益闻留下了。李益闻考虑到和缓与杨、王二姓地主的冲突，就拉当时在南阳宛南中学任教务主任的杨庆昌（尉五）回县任南召县联防主任。杨庆昌是杨老庄人，在南召没有群众基础，他担任联防处主任实际上是挂名，重要问题多系李益闻决定和处理。这一批人回到南召

以后，于1937年11月11日成立了南召县联防办公处。1938年元月底（春节前）我回到了南召，李益闻把我安排在联防处工作，当政训副主任。经过一段工作，我感到有好多人都联不上，便同李益闻商量，为了大家团结合作，成立了一个以李益闻为首的半公开组织“南召县工作委员会”，李益闻当选为主任。委员有胡子云、傅真如、王次如、张超然、张景芳和我，还有彭寿松、周锡侯，周杰邦、郭海昆、杨庆昌、任冠五、杨铸英、袁峻峰、段雅亭、赵名林、赵安义、袁宝岱、王峻昆、张子高，共二十一人，其中共产党员七人。分别担任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县联防处主任、军训主任、政训主任、副主任、教育局长，民教馆长，三个区的区长，区联防主任、政治指导员，第二区军事指导员，第一、七、八大队长等职。县以下各区，乡都建立了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后，统揽全县一切大权，国民党县政府办什么事情要先找李益闻商量，在处理一些问题上不敢提出反对意见。联防处政训处编印了一本《政治工作纲要》，里面提到了“南召县工作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国民党弄到这个本子，就认为这个委员会是共产党的组织。

南召县联防处成立以后，主要作了两件事：一是整编枪支。把民间枪支按甲、保、联保、区、分别编成班，分队，中（联）队，大队、区团。南召共编了三个区团（原称区联防处，后改称区团）。第一区区团长是周锡侯，政治指导员张超然；第二区区团长是郭海昆，政治指导员赵安义；第三区区团长是袁峻峰，政治指导员胡子云。二是训练联防队干部，把全县的分队长、联队长集中起来进行训练。训练班名义上是联防处办的，实际上由我党控制。经李益闻同意，胡

胡子云、王锡璋、党及辰等同志都是训练班的教官。

枪支整编以后，全县组成了七千多人枪的地方联防武装，分别集中到各区训练，声势很大。训练所用的粮食，由全县的大户负担。而余坪地霸王辅之抗拒不交，我们研究决定用武力攻打这个封建堡垒。由李益闻出面说服县长，下令联防队去打。调县常备队（队长吉德林，共产党员）和第八大队（队长王峻昆，共产党员）去兴师问罪。王峻昆亲自带人占领了余坪周围的山头。绅士们找县长说情，李益闻力排众议，又从别廷芳处借来一个迫击炮连助战，王辅之被迫投降，如数交出了粮食和一部分枪支。

我们回县后，对掌握武装工作比较注意。从抓政治指导开始，多数联队、大队的政治指导员是共产党员。这些指导员名义上是区团部提出来的，实际是党组织的安排。张超然胡子云都是区团部政治指导员，县政训主任是傅真如，后任是我。提出名单，李益闻都表示同意。

县委成立后，我们认真分析了联防队干部情况：联队长是我们通过李益闻安排的，大多数是党员。分队长大都是地主子弟，倾向我们的不多。成份比较好的是班长，绝大多数是贫农。他们有实际本领，能联系群众。因此，我们决定举办班长训练班，把这部分人争取过来。这个主意得到了李益闻的支持。由我和张超然，王次如、吉德林四人负责，于1938年冬，用三个多月时间，办了六期班长训练班，每期半个月，共训练班长300多人，在训练中发展共产党员200多名。这些人多是地方党组织介绍来的优秀分子，入党后情绪很高。回去后，不少的当了分队长，占分队长总数的半数以上。草庙、马市坪、乔端的联队长、分队长、班长

大都是党员。

改换政权力量是我们注意解决的又一个问题。南召县复兴社忠义会头子蔡毓强，又是忠义会“三十六弟兄”的头子。担任着南召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实际是二县长）李益闻回去后顶了他这一角。扬庆昌接任了蔡的复兴社忠义会头子。蔡毓强非常恼恨，对于我们回县工作的一班人，他一股脑都反对。1938年秋，李益闻通过别廷芳派武装到南召将蔡扣押，带至南阳途中执行枪决。杀蔡后震动很大，国民党南召县党部书记赵广心听到这个消息，畏惧得连夜逃避。国民党没有办法，只好派扬庆昌的族叔扬廷升任南召县党部书记长（以前只有书记）。

撤掉蔡毓强的职务后，有个“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味道，大批换人。原忠义会的“三十六弟兄”，担任着全县36个乡的联保主任。他们当中很少不贪污，民愤很大。我们从有利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出发，决定换掉这一批人。于是，在上边安排人，下边发动群众告发贪污，将他们撤换。我们提出来的人选，李益闻都同意。李益闻提出来的人，一般的县长都同意。撤换后，在全县36个联保主任中，共产党员占20多个。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必须广泛地发动群众。1938年初建立的“南召县农村救国服务团”，六月间被国民党南召县党部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七月，县民众教育馆长赵名林外出，我代替他在那里搞一段工作，发现一个文件：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号召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战时服务团，要求县长兼团长，民教馆长兼副团长，但是没人搞。我和同志们商量，借这个名义发展群众组织。经商谈，

李益闻和县长都同意。便于1938年7月成立“南召县战时服务团”，团部设在民教馆，由我负责具体领导。各区、乡、保层层设立战时服务团的分支机构，经过发动，全县参加战时服务团的以农民为主的各界群众数千人，遍布在城乡各地。在开展活动中，依托小学教师和联防大队，中队指导员大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成立救亡剧团、演剧、唱歌、出墙报、写标语，作时事报告，动员参军，搞抗日募捐，慰问抗日军人家属，学习文化等。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妇女团、儿童团。当时还办个《南召快报》，收录新闻，报告战况，每期加个小评论，我每天都要干三个钟头。写出后，在党员王治亚的石印馆里印出散发各地。抗日救亡活动一时搞得轰轰烈烈。

李益闻对国民党不抱任何幻想，斗争很坚决。1939年夏，县党部大量发展国民党员。经地委同意，担有公职的共产党员可以参加国民党。李益闻坚决不参加，我劝他讲求斗争策略，他才勉强加入了国民党。他对共产党怀有好感，同情、支持党的活动。1938年4月，由我介绍郭以青到李的住室，郭以青以南阳地区党组织负责人的身份与李益闻会见交谈，李很高兴地接见他。谈后，李有事出去，郭就在李的屋里休息。后李益闻对我说：郭以青是个很有头脑的青年。我和李益闻相处当中，他有事总是和我商量，他可能感到我是党的领导人。

1938年夏天，全县训练壮丁的时候，别廷芳来到南召视察，向李益闻提出傅真如、李年、王锡璋有共产党嫌疑，要他们离开南召。此后，组织上把王锡璋调到镇平工作，李年由曹店调到草庙，傅真如退出联防处，去李青店专

作县委军事部长。为此，傅真如对李益闻严重不满，认为环境好的时候自治派利用我们，环境不好时不能为我们抵挡一阵。当时处于孤立地位的杨庆昌常感到有职无权，怨恨自治派，很想拉一批力量与李益闻分庭抗礼。傅真如与杨庆昌互相之间自然形成了结合。傅真如在党内吹捧杨庆昌有力量，是主要团结对象，更进一步提出与杨庆昌拜把子。事后，地委来信不同意这样作，才慢慢冷下来了。1939年秋傅真如又回到县联防处当了参谋主任。

从1939年上半年起，南召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因为国民党发现了我们成立“南召工作委员会”，又发生了打余寿和枪杀蔡毓强事件，加之我党的工作有所暴露，所以南召的反动势力向国民党省党部告状，说李益闻、彭寿椿和我们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地委、县委成员，别廷芳也来责问，对李益闻的压力很大。为了对付上面的压力，他向我们提出了把外地知识分子撤出南召的要求。

进入1940年，南召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省政府要“国民抗敌自卫团”改为“国民兵团”，团长由县长兼任，副团长要由国民党政府委派。对南召来说，实质上是要搞去我们和自治派的兵权。消息传来，大家议论纷纷，李益闻派我去向别廷芳请示。我到南阳见了别廷芳，他提出：“县里退出，区里顶住”，县自卫团的牌子可以摘掉，改个名，原摊子不动，区里不变。他说，已和省党部谈妥，原县国民自卫抗敌团副团长可以改任县党部书记长。我回来传达了别廷芳的意见，大家才安下心来，杨庆昌改任了县党部书记长。

1940年4月，别廷芳病死，李益闻失去了强有力的后盾。

1940年夏，有一支国民党队伍经过南召，我劝李益

闻提高警惕，出去暂避一下。结果这支部队只是路过，没有发生问题。这件事也可能导致李益闻产生麻痹思想，以后国民党一一〇师进驻南召，他未躲避。

1940年9月，国民党河南省党部通知要派党政军视导团到南召解决政治思想问题。当时县党部书记长杨庆昌去洛阳开会，傅真如在县党部当干事，把这个文件拿给我看，我报告给地委。紧接着杨庆昌从洛阳来信说洛阳要我，杨叫我尽快离开南召。不久，地委书记刘清源来信撤退我。我向李益闻讲，要到南方去复学，他表示同意。当时，我曾请示刘清源让李益闻和我们一起撤走。我和李益闻谈话时，他说只要外边不来军队，南召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我走了，南召这个摊子没人支撑”。表示不想离开南召。

李益闻先生一生贫困，没有嗜好，不吸烟、不喝酒，少私欲。回南召时30多岁，1926年回来，到1942年奋斗了十六年，最后死在国民党手里。国民党对他极为仇恨，逮捕后没有审就杀害了。

（根据袁宝华同志谈话，李宪全同志整理）

1989年10月

袁宝华同志在抗战期间任中共豫西南地委委员，青年部长，南召县委统战部长。现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念李益闻先生

郭以青

抗战开始以后，李益闻打出“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旗帜，符合人民的要求，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并且和回乡的各种势力建立了统一战线，这就是新的自治派。自治派的形式还是过去的，但添了新的内容，增加了政治工作。李益闻是中间派偏左的，和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和国民党一直在斗争。他根据多年的经验。对国民党有很深的反感，警惕性很高。

共产党与自治派合作共事当中团结得很好。李益闻看出来袁宝华是共产党，只是心照不宣。袁宝华看出来李益闻靠近我们，听从我们的主张，有和我们合作的愿望。宝华认为我们党应该和李见面，李也愿意和我党见面，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宝华觉得虽然他作李益闻的统战工作，但是李的学生是晚辈，又在李的手下工作，代表党和李先生谈话不合适。考虑到我去更郑重，严肃些，就提出让我代表党与李益闻谈话。过去我也认识他，在平津同学会时和他见过面，只是一般认识。1938年4月宝华事先约好，介绍我们见面。这次我以南阳地区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代表党组织与他见面，使李益闻认为共产党对他是重视的，增加了信赖。交谈中，

我谈了形势和我党的看法与主张，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他们不动员群众，抗战就不能胜利。共产党号召全民族起来抗战，这一点同国民党有矛盾。他也认为共产党团结民众抗战，才能取得胜利。我提出和他合作抗战，协助他把南召局面搞起来，希望他发挥作用，和共产党一起把南召搞好。他同意，态度很诚恳，说宝华不错，工作踏实。他估计傅真如是共产党，对我说傅真如浮夸，爱吹牛，这个人靠不住。并告诫我们多作些切实工作，积蓄力量，少作些惹国民党注目的喧嚣宣传。我表示赞赏他的意见。离别前，我提出以后有事请他和宝华商量，暗示了袁宝华代表党组织同他相处，他很高兴。

1938年8月，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把别廷芳请到武汉，同蒋介石会面。蒋介石向别廷芳谈了反共的一套，别廷芳回来大骂共产党是“苏联走狗”，“共产共妻”，并且下令解散镇平县青年救国团这个抗日群众组织，逮捕了进步人士王扶山，一时把局势搞得很紧张。我见李益闻说到此事，我说：“别廷芳一翻脸，南阳的局面要大变，他没有什么‘大局’要顾，一下子就可抓出一串子，我们感到很不好办”。李益闻慷慨表示要去规劝别廷芳。他到内乡对别廷芳说：“当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国民党上层人物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频繁交往，打得火热。他们不反共，为什么叫我们反共呢？这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挑唆地方势力互相惨杀，两败俱伤。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他想用这种办法消灭地方势力，咱们切务上当。青年们都是本乡的孩子，有什么不对可以劝说，最要紧的是提防国民党乘机搞掉咱们”。别廷芳很同意李益闻的意见，立即释放了王扶山，放松了对镇平青年救国

团的追究。

1938年夏，河南省政府来令，指责现代中学，李青店小学、曹店小学部分师生是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八路军抗战等；现代中学只讲政治课，不讲数理化，要将一部分教师辞退，要求离开县境。县教育局长段雅亭呈文说：现代中学系一私立中学，无法过问。经查，教员在课余搞抗日宣传，没有搞共产党活动实据。省政府认为段雅亭违抗命令，下令撤职，派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广心接任县教育局长职务。同时撤消上述几个学校。我和李益闻交换意见，李益闻说：“现在不是几个学校能不能保住的问题。而是谁吃掉谁的问题。这家伙搞不住他，一切都不行了，我们誓下决心吃掉他。对国民党就得抗着，你顶着了他，再商量，什么话也好说。抗不住，顶不住，叫他们治着咱们了，什么话也不好说。”李益闻主持召开会议，号召各界人士，各学校校长教师大造议论，宣扬赵广心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的劣迹，反对他接任教育局长。校长、教师联名向省政府控告赵广心的罪行。李益闻又动员开明士绅联合向省政府呈文，请求收回成命。省政府教育厅迫于群情激愤，准予所呈，段雅亭继续任教育局长，各学校照常工作。李益闻又借助别楚芳的力量，把时常闹事的蔡毓强以汉奸罪名杀掉，赵广心畏惧逃遁，南召局势日趋移定下来。

1939年夏，日寇侵占唐河、新野后，直接威胁南阳，逃避在南阳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准备迁驻南召。并已派人来南召安排。我们很紧张，认为他们这一来会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我和李益闻商议进行抵制。他派教育局长段雅亭与省政府交涉，最好不让他们来。若堵不住，让出县城。

守李青店。李青店若守不住，把县自卫团司令部与县政府分开，以草庙为中心，依靠我们掌握的武装力量与之迂回对抗，不会把我们怎么样。停一段时间，省政府不来了，也就算了。

在上层人士中给我印象最深，对南阳地方党的工作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帮助最大的是李益闻先生。李先生从创办南都小学起，终生为家乡文化教育建设和政治改革积极奋斗。抗战开始后，和我们并紧作战，直到惨遭反动派杀害，是南阳最值得纪念的进步人士。抗战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除宝华同志和他日常相处外，我代表地方党和他发生过关系，并从他那里学到不少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策略。遗憾的是我当时对他的意见重视不够，没在党的会议上认真研究，切实采纳执行。而南召许多作上层工作的同志，受傅真如的影响偏重于争取团结杨蔚吾（庆昌），却对李先生不大支持。我离南阳前曾通过宝华征求他的意见，希望他能到抗日根据地暂避一时，俟机再重整旗鼓，对反动派回戈一击。他表示暂无必要，以后看情况再说。我们对当时形势也估计不足。所以没能下决心保护他撤下来。接着宝华奉命撤回延安，党和李先生便无密切联系了，以后在南召县革命、反革命决生死斗争的关键时刻，失去地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广大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群龙无首，惨遭屠杀；老谋深算，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经验的李先生也孤立无援，措手不及，而喋血家门。此后，我每一念及南召这次事变，便深恨自己行前未能

完成党的任务，且有负李先生对我们的依赖和希望。

（根据郭以青谈话，李完全整理）

1989年10月

郭以青于抗战初期任中共豫西南地委副书记，1940年4月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任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

坚强的爱国主义者李益闻先生

段雅事

李益闻先生为人诚恳直率，作风正派。青年时期因家庭贫穷，为了免交学费，只投考了师范学校。他勤奋读书，学习成绩优异。从事教育工作后，常愤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军阀混战，国民党南京政府贪污横行，鱼肉百姓。他立志改良社会，在南召县创办地方自治，为人民谋福利。1933年、1934年两次遭河南省政府派军队围攻，被赶出县境。先生离开南召到内乡天明寺宛西师范任教。继任赤眉镇小学校长。据说李先生在宛西师范任教期间曾自编结合实际应用的教学讲义，很受学生欢迎和学校赞扬。在小学倡导启发式教学，成绩卓著。他还参与过编写内乡治河造林改田经验一书（别廷芳用此书在宛西师范对学生作过讲演）。他对南召地方自治事业被摧残失败，受反动势力迫害，并不灰心动摇。他心胸坦荡，以有志竟成自勉。他常和自治派同人联系，等待时机，自信将来定能第三次回南召继续办理地方自治。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国民党军不战自溃，华北危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发动全国人民抵抗日寇侵略，反对蒋政府“安

内攘外”的卖国行动。李先生曾激动的说：清朝自鸦片战争以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袁世凯承认卖国条约，称帝求荣；蒋政府媚外投降，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李先生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振臂而起，表示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战救亡的号召。

抗战开始时，河南省政府和宛西自治派矛盾缓和，别廷芳在南阳成立河南第六区联防处，任联防处主任，宛属各县相继成立县联防处。别廷芳主张李先生回南召搞联防工作。当时南召县国民党头头、官绅、恶霸，复兴社法西斯分子把持地方，惨害百姓，对李益闻回县的阻力很大。李先生意识到要改变这黑暗社会局面，只有支持进步势力，联系地下共产党人共同奋斗，才能有所成就。他积极联合进步人士袁峻峰、袁宝岱、杨庆同，帮助杨蔚五（庆昌）回南召成立南召县联防处。支持地下党人王锡璋、胡子云、党及辰等到南召搞革命活动。从此革命势力和自治派联合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使南召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了迅速发展。

南召县联防处政训处主任傅真如，袁宝华，指导员王锡璋、胡子云、党及辰、王峻昆等大学生，在祖国受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蹂躏压迫的民族存亡关头，以人民利益为重，在联防处经费困难，无薪水，吃仓米青菜的艰苦生活困境中搞宣传，搞训练、编材料，他们的热诚爱国行动，得到各界人士民众的钦敬赞扬。李先生亲切的说：“事实说明只有共产党领导抗战，才能救中国”。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厚的情感。

1938年初，李先生回南召后任南召县财务委员兼主任委员。这个机关过去是由县里头号士绅担任，和县长狼狈勾结，操纵县军政大权。李先生主持工作后，一改旧观。县

各机关、各区、乡军政的一切事宜，都必经委员会讨论决定。联防处设政治部，各区、联队设政治指导员。成立清丈土地委员会，制订发展生产计划、治河造林改田等，并负责和县政府，驻南召的外界机关，团体交涉谈判一切问题。李先生积极主动走访城关士绅，如当过县长，少将的有名望人士吉少峰，清朝秀才士绅李耐岑，连任多年南召县商会会长的刘位卿，教育界知名人士吉丹林，老教师吉宾卿等。李先生同他们商谈，征求改进地方工作的意见，尽量团结各界、各阶层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的行为则予以揭露斗争。

地下共产党人领导群众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进步势力日益壮大，得到了人民的赞扬和拥护。各机关、各区、乡（镇）联防处政治人员，各区团长、联队长、县常备队，教育界负责人中的进步人士逐渐增多，使地方反动势力十分忌恨和恐惧。他们向河南省政府，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告状，说南召地下党活动厉害，南召成了“小延安”，指名道姓的向上举报。河南省政府命令南召县政府辞退在南召工作的外界人张介平、李年等，并授命别廷芳在1939年春第二次到南召视察时（第一次是1937年冬）打击地下党。李先生受新思想的影响，被地下党人的抗日救亡艰苦奋斗的崇高意志感动，认为宛西自治办法有它的局限性，进步青年是建设南召的主要力量。自治派过去的骨干工作能力有的赶不上形势的发展，有的思想不坚定。李先生向别廷芳郑重说明在南召工作的本县人大都是大地主家庭子弟，不会搞共产。南召县教育落后，缺乏人材，外县人在工作教学方面有成绩，经查他们宣传抗日，并没有宣传共产主义。他将南召自治派